

【旅美感怀】

□陈中华

此番美国行最不愉快的是在旧金山机场被延误了两天时间,不仅没讨回说法,还感觉受了人格欺侮。

依行程安排,我们早9点由洛杉矶机场启程,乘英国维珍航空公司飞往旧金山的班机,再转乘中国东方航空公司班机回国。此前及进入洛杉矶机场都很正常,天空晴朗,阳光明媚,飞机起降看似井然有序,但我们搭乘的班机不知何故,拖后近一小时才检票。登机后算计,若及时起飞、时间虽然紧迫些,在旧金山机场仍可转乘得上。不想,登机后飞机仍未及时启动,直至快11点才起飞。这中间还出了一个岔子:在洛杉矶机场,该公司给出的机票卡上恰现一道印刷空白,座号识别不清,机上中国面孔极少,语言不通,未了好歹找到座,但随身行李已在寻座时放后面了,行李柜已关闭,无法调整。飞机抵达旧金山机场没停稳前,不允许起身取行李。待机身停稳乘客已将窄道壅堵,取行李又延迟了下机,转机口还很远,待急咻咻赶到东航营业窗口办手续,已见“停止办理登机手续”字样。工作人员说,最早也只能改乘两天后的班机了。

我们一下子就瘫了。

这是我们今生遇上的最大一次出行难:一,两人早忘干净了英语,无法与外界沟通;二,此前没考虑到会出错,二人身上总共才揣了十几美元,且都没带银行卡;三,在旧金山无亲无友,两人的手机在美国不知何故不好用,干脆没充电,放托运行李中了,与正飞往丹佛的儿子无法联系。这两天如何吃?如何住?如何行?

东航一姓黄的中国小伙

# 我在美国机场涉纠纷

闻知后,主动替我们取出托运行李并代存放,为我们改签了两天后的机票,告知我们,依一般规定,若飞机延误非属天气等不可抗原因(电脑上可查询真实信息),航空公司应向乘客提供食宿等服务。考虑到语言障碍,他以英语写了一短笺,让我们持笺下楼到那家公司营业台交涉。两天后仍是他代我们取出行李、代办托运……对比那家英国公司,我切实感到了中国公司上乘的服务质量令旅客心暖。这是另话。

再说找英国那家航空公司交涉。

短笺交给对方后,对方电话招来一位会说汉语的欧罗巴面孔中年女士,妻子担心我脾气坏,不让我说话,她则哭也似的向对方诉说,而当我听到对方可以帮忙联系、食宿行等费用皆由我们自己承担的话语时,再也按捺不住,上前抢嘴,妻子阻我,我猛力将妻子推到一边,直面那女士。

我才说话,那女士即怒视着我说:“你这样做在美国是不被允许的!”我稍一蒙,倏地意识到,她或许指我刚才猛力推了妻子一把是一种“暴力”。我猝然醒过神来,连连向对方道歉,但不等我道歉完,女士即以一种鄙夷的眼神睇了我一眼,径自出门走了。

正焦急,不想,顷刻间来了三男一女机场警察,盯住了我们。其中一近五旬中国面孔男人会讲汉语。随着我们的讲述,警察显得随和起来,会讲汉语的警察笑眯眯地与我们聊,说已明白了事情经过,但延机纠纷不归他们管,即使航空公司负责,恐怕也会因程序办理拖延几天,最好我们自己想法度过这两天先飞回去。之后,警察和已抵达丹佛的儿子联系上,儿子很快打电话找到他一姓罗的女同学,女孩驾车百多里路到机场来接我们,警察握手送我们上了车。而这几个小时里,那女士再也没露面。两天后在候机大厅,我们又恰与那中国面孔警察相遇,妻子还向他讨要了名片,并合影留念。

这经历,令我长久感慨,长久心情不适。

首先,必须检讨自己。显然,自己当时“猛推妻子一把”被对方视为暴力之嫌了。这里,我不能去强调国情、习惯、脾气、“就是轻推了一下”等,因那毕竟是在美国国土上,这就有了入乡是否随俗的问题。此前,儿子一女同学曾说:弟弟与女友吵架,恰在美国警察入门的空儿,将女友推倒在沙发上,女方后

来起诉他要求赔偿。我当时怀疑女孩淡化了弟弟的粗暴程度。此时,对比我的行为,我相信那女孩的话了。这使我联想到几年中多起中国人出境不经意间被处罚、被舆论谴责事件,最典型的莫如父母伴孩童在香港街上大便一事了。亲涉旧金山机场纠纷,我不能不说,随着中国人出境的增多,需要更了解、遵守当地的法规和习俗。

我的过错具有代表性。

思考的第二个问题,这家公司的做法代表着我一向崇尚的西方文明吗?我困惑不已。他们究竟对我们误机有无责任?应当如何承担?那女士特别的眼神令我没齿不忘:充斥在她骨子里的轻蔑和歧视。若不,她不会叫来几个警察控制住我们了事,再也不理睬我们的诉求。关于维权,此文不想多谈,原因是儿子已找了律师想以法律手段维权,我担忧打官司得罪什么人,再影响以后我们入境。儿子说,不会的,在美国,就事论事。

他又说:若真因打这官司入境受到影响,爸爸,你和我就成了两个英雄而回国了。

这是我迄今听到儿子最幽默的一句话。

(本文作者为大众日报高级记者、国家一级作家)



【追忆往昔】

□戴永夏

我的恩师张蕾教授是著名的文史专家,也是一位杂文作家。他学识渊博,经历丰富,对文坛掌故颇为熟悉。去年春节我去看望他时,他讲了一段六十年前《大公报》编辑向他等作者约稿的故事,令我至今难忘……

那是1956年初春的一天上午,时为山东师范学院(今山东师范大学)中文系青年教师的张蕾正在系里参加“整风”学习,忽然接到传达室的电话,说有一位从北京来的女编辑要见他。放下电话,他立即赶到传达室,见一位年轻漂亮的女编辑正站在那里等他。还没等他开口,这位女编辑就“扑哧”一声笑了。这一笑倒好,作为陌生人初次见面的拘谨立刻消失了,彼此说话也比较随便了一些。在去办公室的路上,张蕾问女编辑刚才笑什么,她仍微笑着说:“听人家介绍你的名字,我原以为是个女同志,想不到,却原来是……”可能因初次见面,她说话还有所保留,所以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张蕾听了便接着她的话茬说,“原来是个黑大粗的男人,对吧?”她只是笑笑,没说什么。

经过交谈,张蕾才知道来者是《大公报》副刊编辑诸靖华,这次专程来山东约组杂文稿。她先到了山东省文联,文联又介绍她到山师找薛绥之(1985年去世)和张蕾两位先生。

当时,思想文化领域正在贯彻“百花齐放,百家争鸣”的“双百”方针,政治气候还比较宽松,杂文创作也出现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气象。为了繁荣文学创作、批评社会弊端,当

# 六十年前的编辑与作者

时全国各地报刊都拿出较多版面刊登杂文作品;并纷纷派出编辑、记者,到各地联系作者,约写杂文稿件。正是在这种形势下,《大公报》的这位女编辑才到山东来约稿的。

他们来到办公室,谈话便转入了正题。张蕾当时已是省内有点名气的杂文家了,在省内外媒报上发表了不少杂文作品。诸编辑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,也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。共同的志趣和爱好消除了彼此间的隔阂,所以二人初次见面便无拘无束地谈起了文学创作的若干问题,诸如新时代表杂文的性质与特点、杂文的政治性和文学性、杂文的语言特点以及杂文作者的顾虑与恐惧等……谈了一会儿,诸编辑又在张蕾的陪同下,到教工宿舍去拜访薛绥之先生。

薛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家,时在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讲授现代文学。教学之余,他常以“东方一”的笔名,在报纸上发表杂文作品。

薛先生不拘小节,生活随便,工作经常“开夜车”。又因与爱人两地分居,生活无人照料。他那间仅可容身的平房斗室,经常乱糟糟的。走在路上,张蕾见诸编辑那娉婷婷、文文静静、通身透着高雅气质的样子,就暗自担心,薛公的“雅舍”她能否进去、坐得下?果不其然,当薛先生的房门打开后,一股浓重的臊味便冲门而出。张蕾不由得往后退了一步,下意识地瞥了诸编辑一眼,看她有什么反应。没想到她却若无其事地走了进去。进屋之后,只见桌上地下散乱堆

放着许多书籍、杂志;床上的被褥没有叠,零乱地堆在一起。最刺眼的是床前那个当夜壶用的痰盂,里面满是浑浊的黄汤,散发出令人窒息的臊味。面对突如其来女宾,薛先生也有些尴尬。他赶紧将痰盂往床下塞了塞,顺手推了推床上的被褥,腾出了一席床角,让客人坐下。张蕾则斜倚在墙角一个堆放杂物的破凳子边上。薛先生转过身来坐在他那张旧书桌前。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,诸编辑谈笑自若地跟两位作者交流思想,谈编辑方針和写作要求,并认真地向他俩约写稿子。

谈完工作,已近中午。诸编辑辞别了薛先生,离开了他那间小屋。路上,张蕾感到有些不好意思,便想替薛先生作些解释。而诸编辑却毫不介意地笑着说:“这没有什么,要不怎么叫文人呐!”她对作者的理解、宽容和尊重,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从薛先生那里出来后,诸编辑要回下榻的旅馆。张蕾怕她回去错过开饭时间,说不定要饿肚子(那时不像现在这样到处是饭店,不在食堂吃饭就几乎无处找饭吃),便坚持留下她吃午饭。那时,学校为了照顾教职工的生活,在食堂内另开了一个小炒部,在那里可以炒两个好一点的菜改善生活。张蕾把诸编辑带到那里,炒了两个菜,又专门为她要了一碗米饭。虽是普通的饭菜,但诸编辑吃得津津有味。二人边吃边聊,谈得很是愉快……

诸靖华回到北京后,给张蕾来过两封信,其中第一封信

谈了她到山东约稿的感受。她说,当编辑的人,有一个苦恼,就是外出约稿常常会受到作者的轻慢,甚至有时还要吃白眼。她此次山东之行则不然,感到很温暖。她深深领受到作者与编辑作为天然盟友的那种相互依存、相互尊重的真诚关系……读了这些热情洋溢的话,张蕾先生很受感动。

此后,张蕾应约给诸编辑寄去一篇杂文,是谈关于儿童教育问题的。然而不久,一场轰轰烈烈的“反右派”运动在全国展开。张先生寄去的稿子没有发表,彼此的联系也从此中断了。运动开始后,张蕾也因写了一些杂文而受到批判。他心想,多亏寄去的稿子没有发表,否则,这又会给他增加一条罪状。尤其当时《大公报》在全国有很大影响,在上面发表杂文会带来什么样的厄运,实在难以预料!

光阴荏苒,倏忽间已经过去近六十个年头。六十年来,世事沧桑,当年年轻的杂文作者张蕾教授已于2015年2月4日作古;而诸靖华编辑如果健在,也该是年逾古稀的老人了。对于她身上体现出的那种老新闻工作者的良好职业道德和不怕苦、不怕脏的工作作风,对于那种编辑与作者间的“相互依存、相互尊重的真诚关系”,张蕾教授生前一直念念不忘。他衷心希望在实现“中国梦”的新征程中,过去的一些优良传统能进一步发扬光大,也希望新闻界能有更多像诸靖华那样的敬业编辑!

(本文作者为作家、编审)

济南南倚泰山,北跨黄河,天然形胜,尤其是因为清泉百数,妙绝天下,故号称“泉城”。“泉城”是济南人拜大自然之赐,更是先民逐水而居的智慧的选择。但是,想来先民逐水依泉,起初不会是由于“池塘春草”的雅兴,而是看上了“一箪食,一瓢饮”的方便。这只要看看至今市区内杜康、琵琶、白石、玉泉等泉,尤其深藏闹市的黑虎泉畔,终日人来人往、熙熙攘攘,桶装瓶贮、勺泉以归、煮粥烹茶的景象,就可以知道了。所以,“泉”字拆而为“白”、“水”,“白水”就是“绿色无污染”的净水。自古及今,济南人眼里的“泉”首先就是“白水”,临“泉”而居的大福分之一,就是不劳“大自然的搬运工”,自携瓶桶以受,就能喝上“绿色无污染”的“纯净水”,还是免费,差不多等于“天上掉馅饼”了吧!

虽然老天赐给济南人泉水的好处,决不仅是在这个“没有天上掉馅饼”的世界上至今还可以免费饮用泉水,更是妆点齐鲁首善之区,使其成为驰誉天下的“泉城”旅游名胜之地,但是,济南人勺泉

【生活直击】

## 思想“泉城”

□杜贵晨

归饮之事,仍使我想起“泉城”的泉水从物尽其用的意义上还是大都白白地流掉了!尤其在看到济南市面上瓶装饮用水还大都外来的時候,便不禁有“泉城”之泉水在这个世界上仍是“养在深闺人未识”的感慨:何以能有人千里迢迢做“大自然的搬运工”,而“泉城”之泉近在眼前,却做了“嫁不出去的姑娘”?

因此,“泉城”的人,是否可以想一想:“城”是用来住的,“市”才是生活的来源,“泉城”是不是应该更大力地发展“泉市”?

然而,倘若再往深处想一想,“泉城”之“泉”对于泉城人来说,除“一瓢饮”之用和“池塘春草”的美景好看之外,恐怕还有“形而上学”者,那就是她一面似乎无穷无尽地自地下喷涌而出于人间,一面又在人间“潇洒走一回”之后,无论饮人、润物或汇入河、湖、大海,总归还是要回到地下,准备再一次成为泉水喷涌而出,成为新的循环……

泉水这一川流不停、循环不息的特性,我国古人很早就注意到了,并以之妙喻市场流动不息的“通宝”,把钱币称作“泉”。这一譬喻影响之大,连《周礼》载地官所属掌管税收和货物流通的职官都叫做“泉府”。《汉书·食货志下》也说:“故货,宝于金,利于刀,流于泉。”如淳注说:“流行如泉也。”至晚到宋、金时期,钱币已经被称作“宝泉”,而明、清两代户部掌管铸造钱币的衙门就叫作“宝泉局”。清代著名戏曲家《桃花扇》的作者孔尚任,就曾经做过宝泉局的监铸。

由此可知,中国古代如济南之称“泉城”,“泉”之一字,虽在舆图地志、诗文词曲中多指山浸地涌的“白水”,但在历代政治经济生活中,上至朝廷,下至庶民,“泉”却主要是钱币的别名,比之“白水”在饮用和装点景色的意义上更加引人注目,也同样流行,几乎无所不在地被作为金融商业的象征。

因此,“泉城”之“泉”,又不仅是给了济南人引以为自豪的景观、得天独厚的“白水”和有希望远“嫁”的商用饮用水,同时,自古就是钱的别名,是商业流通和市场经济之血脉——金融——的象征!

由此,“泉城”人似又可以想一想,“泉城”之“泉”是否也体现了济南开埠百年以来作为齐鲁金融中心的一面,从货币“流行如泉”的角度,期待并推动“泉城”进一步成为齐鲁乃至更大区域金融中心的“泉府”?

我一个来寓济南不久又上了些年纪的人,写这些话要做什么?又有什么用呢?作文而已?不尽然也。我爱济南真是一方风水宝地!去年也去黑虎泉打过几次泉水,觉得济南实在应该更美更富,而在这些泉水上就可以做更多文章。我是做不成了,只能想一想,写下我关于“泉城”的一点思想:“泉市”与“泉府”。有意思吗?差不多也就是作文而已。但是,依稀记得某一年一老同学发来贺年的邮件,引一位西方哲人的话说:“如果你要改变你的生活,你必须开始改变你的思想。”

思想“泉城”,这是一点改变吗?

(本文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教授)